

【學人講呢啲】直播與否，怕篤手足灰？ 資深傳媒人呂秉權講如何處理爭議性報導，打好資訊戰

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

不是人人都有勇氣上前線抗爭，但今日只要有一部上網手機，就可以加入資訊戰。網民隨手轉發的文宣、記者搭上生命所攝下的開槍一瞬，都成為龐大資訊網中的條條絲縷，牽動香港人，甚至國際社會的神經。

謠言不止出於救人心切

「現在看朋友的 IG story(限時動態)，有一億條。」楊永樂(Terry) 五年內任職過多間媒體公司，由傳統媒體《蘋果日報》、《天下一》到網媒《100 毛》、《香港討論區》，由 Facebook 小編做到分公司 CEO。現在自由身做媒體顧問，開了 Facebook 專頁「Terry 的媒體懶人堂」教人社交媒體內容營銷。遇上反送中運動，專頁內容便理所當然地成了「抗爭 Page」，不時以營銷角度分析抗爭大小事情，短短一個月多就有近 3 萬人讚好。他說：「資訊戰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很有機，它是有病毒性的。」

以前，以年輕人為主的黃絲陣型愛取笑藍絲常被誇張失實的假新聞騙到，但近來也有不少黃絲誤信、誤傳假消息，助謠言散播。對付假資訊要 fact check，說過上千遍，但 Terry 表示資訊的流通是關乎事情的迫切性有多大：「抗爭者都知道 fact check 重要，但他們會想那段時間分秒必爭，萬一時間一拖，手足已經死了？不如我先傳出去，求『炒車』(譯：同歸於盡)。」他覺得謠言難以由源頭解決，因為造謠本小利大，「但問題是：為何人寧願相信謠言？是因為制度和大環境不容許我們找出真相。為何大專生的死，人們會把賬算到警察身上？並不是因為他們覺得是警察做的，而是警察不肯證明不是他們做的。」

資深傳媒人、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則認為，當事態危急，懷着要阻止壞事發生的心情去轉傳難以核實的消息，是可以理解的。他憶述當年到內地報道沙士，記者收到多方謠傳內地疫症爆發，而官方封鎖消息，所以即使未能百分百核實，人命關天的事件還是要先報道。然而比起無心之失的謠言，更多是捏造再刻意散播的，他說：

「有一種謠言性質是純粹想煽動，炒熱運動，我覺得動機就不太好。有時要陰謀論一點地想：任何人發放資訊都是傾向唱好自己的一方，貶低另一方。」

藍黃文宣各自開花，非常時期新聞難做

同樣是罷工，藍絲看到的是被堵住的路，黃絲着眼的是堵路背後的制度不公。Terry 以一句話總結藍黃之分：「藍絲許多時候就是看着那件事本身是怎樣的，但我們就是看着那件事的本質是怎樣的。藍絲媒體很清楚藍絲真正需要的東西就是不變，所以他們不斷提醒藍絲世界在變。」汲取舊日經營社交媒體的經驗，Terry 很避忌散播失敗主義，因為失敗主義容易惹共鳴，但愁緒長遠而言只會令人卻步。他察覺黃色文宣有時不自覺地踩到這個地雷：「有時在連儂牆會見到『為何學生會中槍？就是因為你沒有出來罷工』一類的文宣，很當頭棒喝，但人是承受不了太多這樣的情緒。又會有另一些文宣說『一個人中槍已經太多，大三罷，用罷工守護香港的孩子』，立刻舒服多了。」沒有大台下，抗爭者會不斷自我調整資訊戰的策略，例如以更精簡的排版宣傳一星期的行動、整合同一主題的討論區帖文等。

新聞業作為最傳統的內容產業之一，對內容的精確度、深度等要求更高；同樣地，發生重大社會衝突時，傳媒的定位及操守會受到更多關注，記者自身亦面對更多抉擇。反送中運動以來，不少抗爭者在網上肯定記者和傳媒的專業精神，感謝他們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緊守崗位；但近日，亦有指摘傳媒是「鬼」、「篤灰」（譯：背後公開投報人的資料）的聲音出現。呂秉權認為是次運動中，記者被視為立場靠近示威者一方是由於記者亦受到警方前所未見的打壓：「政府和警察處理整個抗爭有各種各樣的問題，而傳媒揭發了出來，過程中自己亦成為警暴受害者。但其實記者受害、辛苦、吸催淚煙、被政權壓迫，某程度正是記者工作一部份。這些事情不應該存在，但正正是這些事情存在才需要記者。」

Terry 嘗試分析示威者對媒體隨時變臉的態度，回看整場運動的推動力，正是對手足的同理心：「有人會分黃媒或藍媒，但對一些人而言並不是記者是不是朋友的問題，而是不論你是誰，你報道了對手足不利的消息，他們就會群起希望這些消息下架。」傳統意義上，傳媒應該不偏不倚地報道事實，但採訪經驗豐富的呂秉權也認為就香港

政權、警權越趨大陸化的局面，老派的傳媒守則有時已不適用：「處理一些很具爭議性的局面，我不可以變成一個加害者去幫官方影響到當事人的利益。我們的報道將會影響到別人的生存。」例如上星期理大游繩事件，換了他去處理的話，他認為不可以做直播，並等到事情過氣再以遮樣，甚至遮地方的方式去處理：「背後就是假設所有制度都不可信，這樣的話傳媒在某程度已有立場。但我覺得記者只須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倘若是其他政見的人做一樣的事，你是否都以同一個方式去處理呢？答案是肯定的話，那就沒有問題了。」

抗爭下媒體的時代革命

香港社會急劇轉變，資訊傳播方式和對傳媒的要求也不一樣了。Terry 等媒體人以往在評估社交平台表現時，一般都以讚好、分享、留言、參與度等數字衡量：「但現在每個人也是一個平台的時候，一定要放棄某種計法。香港人日程表可能從來不多人讚好，但它的影響力高過多人讚好的內容。」新媒體跟上時局發展，改變對傳統媒體更是無可避免：「一般而言，傳媒是一個獨立的監察者，不站在任何一方。這種身份可以確保傳媒能夠公正地去監察，亦是一種公信力。但當警察針對傳媒，已經去到忍無可忍的地步，記者在警察記者會上示威，我是支持的。」不代表媒體道德或傳統不再值得堅守，但一切事物也免不了隨時間變化，或許抗爭者正在改變的，比他們爭取的要多。

資料來源：2019年11月28日，蘋果日報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realtime/article/20191128/60317100>